

章开沅 主编  
教会大学在中国  
张丽萍 编著

# 华西协合大学

## 相思华西坝



教会大学在中国  
章开沅 主编

相思华西坝

# 华西协合大学

张丽萍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张丽萍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2

(教会大学在中国)

ISBN 7-5434-5459-9

I. 相… II. 张… III. 华西协合大学-校史  
IV. R-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152 号

主 编: 章开沅

著 者: 张丽萍

## 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策 划 / 路殿维 张艳如

统 筹 / 何建民

责任编辑 / 孟保青 袁鸿蕙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郭丽娜 王海鲸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7.125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459-9/G·3733

定 价 / 18 元

##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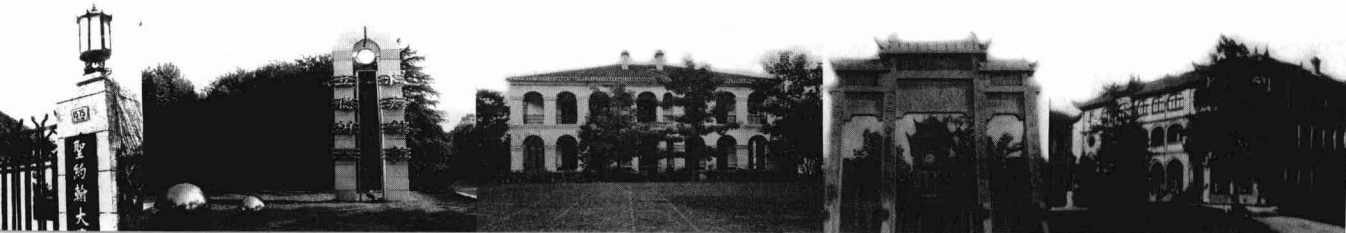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孕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

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



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想，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可能会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毋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

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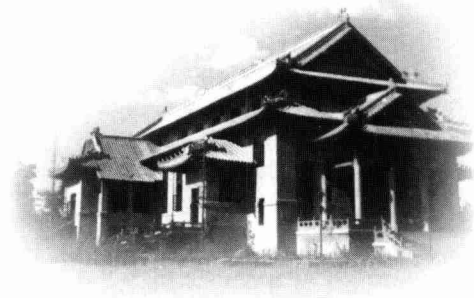
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今年10月是我曾为之工作半个世纪以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也是其前身文华书院创建一百三十二周年，谨以这套图片集献给所有曾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勤劳耕耘过的中外先驱者！

章开沅

2003年春于桂子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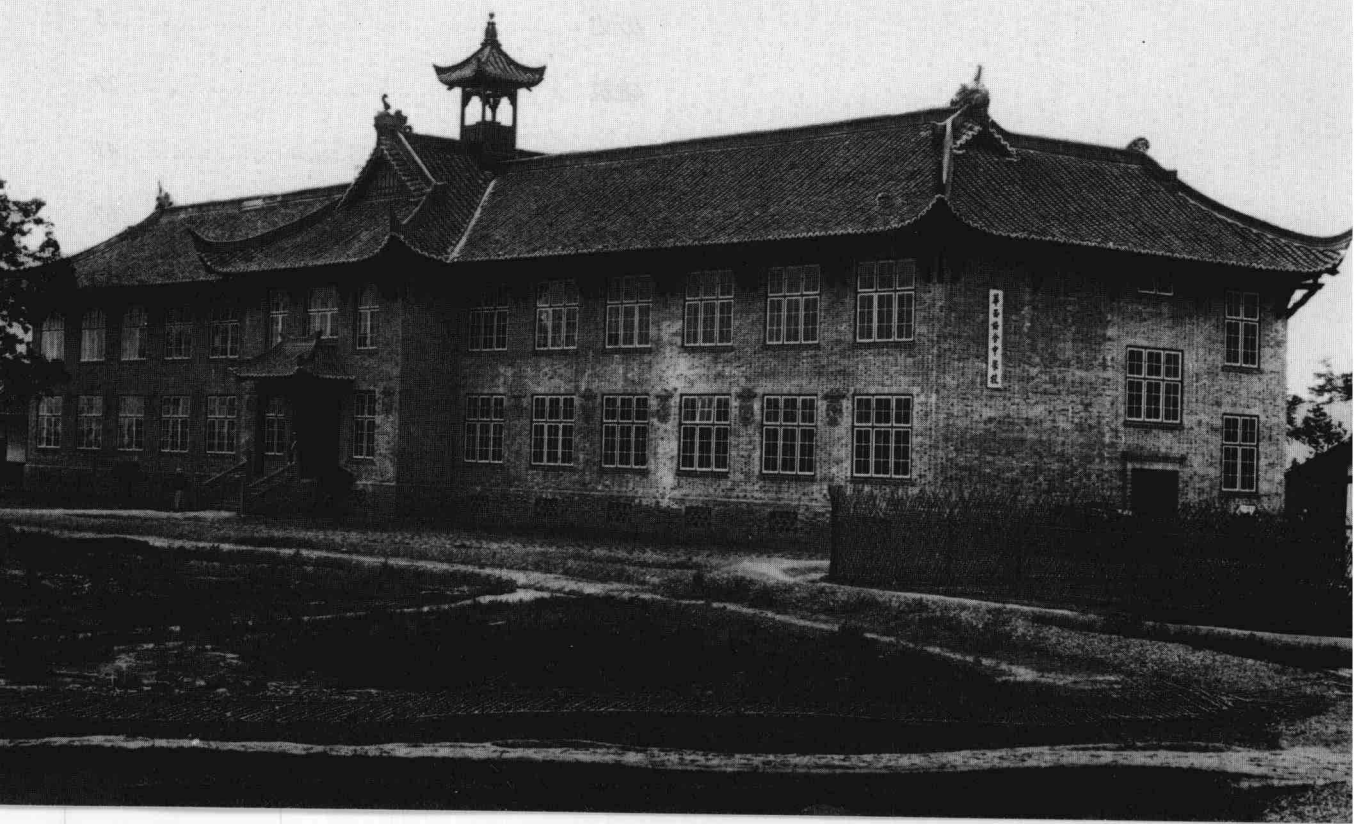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 历史 .....   | 3   |
| 建筑 .....   | 27  |
| 人物 .....   | 41  |
| 教育 .....   | 67  |
| 事件 .....   | 87  |
| 大事年表 ..... | 107 |
| 后记 .....   | 11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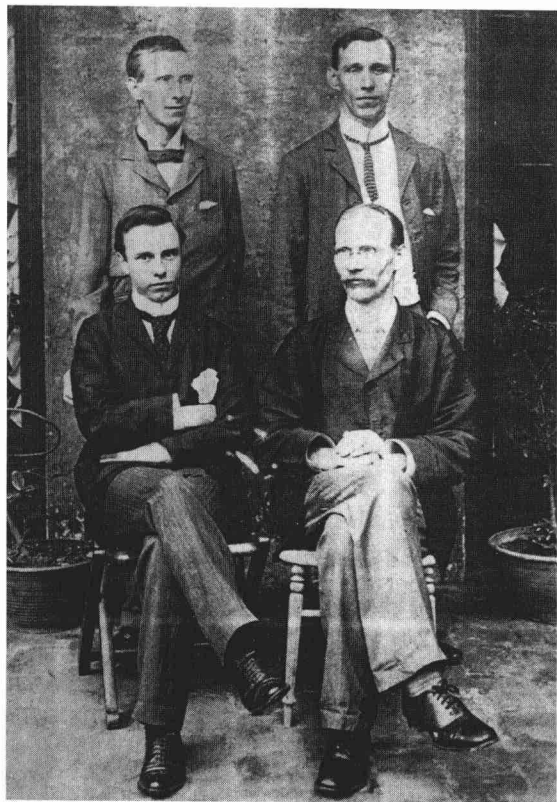
# 历史

---

## 一、走进夔门

四川僻处西南边陲，深居内陆腹地，四面高山环绕，凭借着北面险峻的剑门关，东边的三峡天堑，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但是这块有着数千万“异教徒”的土地，却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传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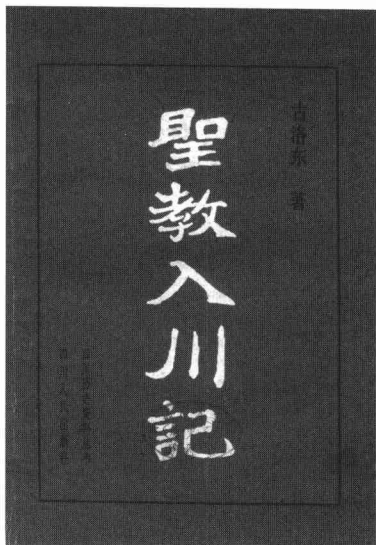
最早进入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是明朝崇祯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利类思于1640年入川，葡萄牙人安文思(Gabriel Magallaens)于1642年从杭州来蜀，协助利类思传教。1644年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杀入四川，利、安二



英国人陶维新 (Davidson, Robert T 坐者右一) 1886年创立四川公谊会。在大哥的带领下,三个弟弟相继入川,在重庆、成都等地传教

人被擒获。张献忠效仿万历皇帝重用西国传教士利玛窦的先例,迎接利、安二人为他的大西国效力,还赐徽号“天学国师”。两人为张献忠造天、地球,以及日晷,受到丰厚赏赐。

不过据称张献忠喜怒无常,滥杀无辜,二位神父常常命若悬丝,惶惶不可终日。1645年张献忠剿洗成都时,利类思在南门上,安文思在东门上,见无数生灵被杀,呼号之声,惨不忍睹,尸横遍野,堵塞河道,不能行船。时值黄昏,安文思见道路两旁死尸狼藉,其



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中,记载了两位耶稣会传教士的传奇经历

中还有小孩呻吟,遂为之洗礼……后来利、安二人又被清军所获,随军到北京,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礼遇,允许传教,二人终老中国。安文思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军中的经历和见闻。

继利类思、安文思之后,传教士们纷纷踏上了四川这块土地。他们回国后所写的游历报告,亦引起了一批“探险家”、“游历者”对四川的兴趣。最早入川的“探险家”,主要翻越秦岭,经剑门关入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崎岖的山路,让外国人吃尽了苦头。直到后来英国冒险家立德乐(Archibald J. Little)打通川江航道,长江水路才成了外国人入川的主要通道。

1883年立德乐以游历为名入川,著《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开始对川江航线的探



以滑竿代步的传教士



等待过三峡险滩的商船

险。重庆开埠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川江航行权。1898年这位探险家亲自驾驶他的七吨小轮船“利川号”，穿过长江三峡，到达重庆，开辟了川江航线。紧随其后，英国炮艇“山鸡号”和“山莺号”也高速驶过川江，停泊在重庆码头。继冒险家和军舰之后，各国的商船接踵而至。英国、日本等还建立了专门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这些船只高高悬挂着本国的国旗，从此川江上有了一个新名词“挂旗船”。铁甲船的汽笛声，无情地击碎了巴山蜀水宁静的梦。天府之国，这个男耕女织，鸡犬相闻的千里沃野，也被不情愿地抛入了资本经济的大漩涡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各差会大力向中国西部发展势力，一批又一批怀着实现“中华归主”梦想的西方传教士涌入四川。在传教士的“探险记”、“游历录”中，长江三峡，成了充满酸甜苦辣的话题。面对夔门的惊涛骇浪，他们又惊又喜，犹如站在了

炼狱的大门，既有豪情万丈，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多少人能乘风破浪，又有多少人将葬身鱼腹？

当美国传教士莫尔思（W.R.Morse）过三峡时，曾为岸上的中国少年感动不已。衣衫破烂，光着脚丫的中国孩子成群结队地追逐洋人的轮船，他们冲着洋人使劲地挥手，欢快地呼叫，憨直地大笑……三峡少年的天真浪漫让莫尔思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这位医学传教士，一到四川就迫不及待地地为这里的



莫尔思夫人(A.K.Morse)画笔下的长江三峡

人民开列出一套医治百病的药方：金色十字架为标志的基督精神、绿色十字架为标志的现代医学科学、红色十字架为标志的人道主义。他希望用这三个十字架来洗礼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让他们在体格上、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改善。

走进夔门，仅仅是迈进华西的第一步。当外国人继续前行，深入内地，一个神奇而广阔的华西开始展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发现这里的土地和河流还没有被勘测、丈量；这里的许多动物(如大熊猫，洋人就用藏文“潘达”来命名这一珍稀动物，并由此衍生出了英文Panda)、植物(如水杉)，欧洲的书本中没有记载；这里边疆的少数民族给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在传教士李德良(R.O. Jolliffe)的笔端，四川是那样的绚丽多姿，令人陶醉：“……湍急的河流，激动人心的高山峡谷，终年积雪的山巅，生长热带植物的灼热高原，红色的猩猩木和棕榈树……这块土地上有熊猫和麝

獐；喇嘛教的寺庙和分散各地的布道点；在远远的地平线上，茶树散发芳香，珍稀的药用植物满山遍野；蚕丝、皮毛和桐油都是这里的特产。”

## 二、躁动不安的四川

### 1. 举子与教徒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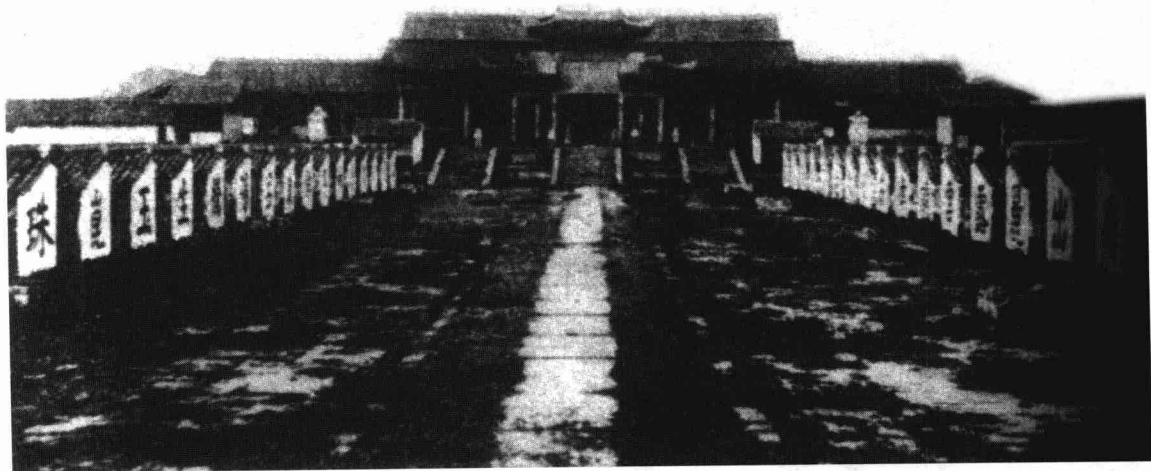
在老成都的市中心，高大的宫墙内，是巍峨壮丽的宫殿，它就是明朝蜀王府，虽为王府，但建筑格局参照北京的宫殿，俨然有皇宫气派，人们称之为“皇城”。皇城毁于明末兵燹，清代这里改建成了贡院。贡院中主体建筑有明远楼和至公堂，东西两边为考棚，院中立有“为国求贤”的牌坊。

大比之年，来自省内各地，考取功名的生员云集贡院，在鸟笼似的考棚内迎接决定他们命运的考试。进考棚前，三三两两的生员，来到在“皇城”西门的平安桥，虔诚的一口年糕(谐音高)一口粽子(谐音中)地祈祷高中。就在他们做着“蟾宫折桂”的美梦时，平安桥街的普通居民却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选择：差不多有半街的住户，不供奉“天地君亲师”灵牌，却奉立着圣父圣子圣灵的画像。

与贡院中“为国求贤”的牌坊形成鲜明



传教士镜头里的重庆东水门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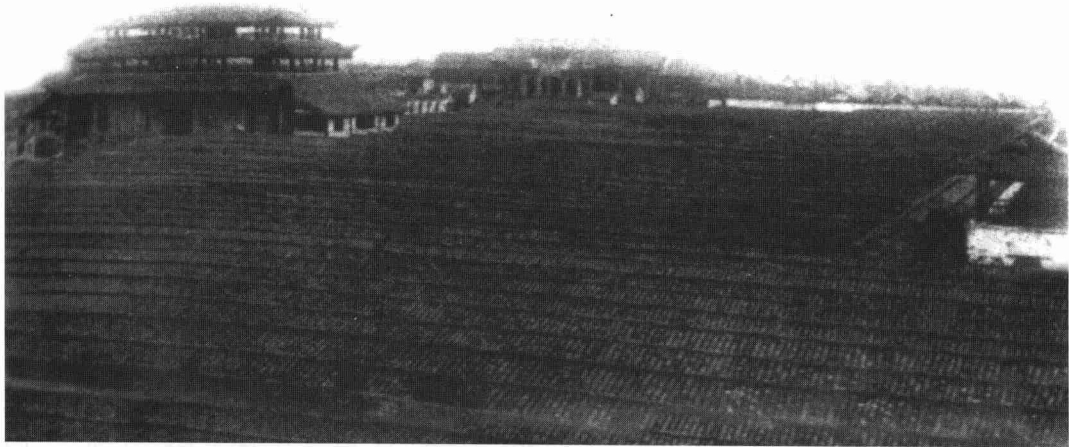


位于成都“皇城”的清代贡院

对比的是，一座天主教堂就矗立在平安桥街的西边，这座教堂是天主教川西地区的总堂，住着一位地位显赫的主教大人，他就是由罗马教廷任命的西川主教，此地号称“主教公馆”。

平安桥上，举子与天主教徒擦肩而过，天主教堂与科举贡院遥遥相对，折射出了大清时代的复杂现象。其时，教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蚕食着四川人的灵魂。不仅罗马教廷派驻了西川主教、东川主教，基督教各差会也派出了自己最能干、最精明的男女牧师，英国内地会最先抢滩四川，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公谊会等接踵而至，加拿大、德国等国的教会，不甘示弱。一串串激动人心的统计数据让教会陶醉。1901年重庆海关华特森给税

务司赫德的报告称，英、美、法、加等国有九大教会在四川，男女传教士三百一十五人，教堂二百二十一所，教徒达十万余人，建有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院等六百七十三处。到1910年，外国教会增加到十三个，传教士增至五百一十五人。各差会在全川建起六个布道总堂，其数量仅次于广东、江苏二省，位居全国第三位。传教士在五十余个城市建立起总堂和布道区，其他小城镇也建立了布道点。一时间，号称地大物博的四川教堂林立，十字架遍设。不仅像重庆、成都、乐山、三台、阆中、雅安等城市、县治教堂遍布，就连不少场镇也有教堂。即使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打箭炉、巴塘、里塘、炉霍等地也建起了教堂。



贡院考棚



英国传教士陶维持 (Davidson, A. Warburton) 与中国教友在重庆传教



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会在川事业分布图

## 2. 老乡哄抢《圣经》的背后

当传教士为老乡们哄抢印有《圣经》故事的传单而欢欣鼓舞时，却很快发现他们只是为了用这些纸张来糊鞋底。

省吃俭用的四川老乡对洋货不敢奢望，传教士们也很难在他们脑子里装进耶稣基督

的圣像。人们对头顶十字架的教堂，是陌生而遥远的，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感觉。对金发碧眼、披着黑色斗篷的传教士，也是充满了怀疑和猜忌。人们像躲瘟神一样避开教堂，信奉洋教的人是会被族人赶出祠堂的。大人们更是千叮咛万嘱咐小孩不可靠近教堂那个会“吃人”的魔窟。有时候在教堂外逗留的小孩，多半都是为了讨牧师的糖块吃。尾随

在洋人身后，亦只是好奇地想摸一下大人们所说的洋人屁股上的尾巴。

成都晚清进士刘彝铭先生的独生子是由平安桥洋医生剖腹取胎的。当时，刘夫人难产，请遍了全城的催生婆、名中医，个个都束手无策，暗中吩咐准备后事。天主教医院的洋医生，比划说只要在妇人腹上杀一刀，取出胎儿，或许还有救。听到如此恐怖的手法，刘家的老老少少大惊失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怕洋医生没安好心，暗中会将产妇和胎儿换心偷脑。眼见产妇奄奄一息，才咬牙将人交给洋医生。谁知剖腹产十分成功，母子平安，刘家一脉单传的香火得以延续，对洋教士自然是感恩戴德。传教士想趁

热打铁，要刘家改奉天主教，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我刘家是书香门弟，儒门子弟，改奉天主教，万万做不到。洋教士只好摇头苦叹：中国是个堡垒，夫子宫墙高万仞，有孔老二把关，难，难，难。

洋教士口口声声要拯救灵魂，中国人还是不买他们的账。耶稣像未必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但洋人的行医济世就来得比较实惠了。中国人是很求实的，例如一个老太婆要杀一盆泥鳅来喂猫，她对着泥鳅，捻着佛珠，虔诚地念着阿弥陀佛，搞了半天她还是将一盆泥鳅喂了猫。

成都平安桥半条街的天主教信徒，正是因为傍着天主堂圣修医院住家，可以享用免



成都陕西街存仁医院内的福音堂

## 112 重庆两教堂大门被秽物污毁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1） 总监正陈恒升稟

九月二十四日（11月10日）

具禀本城崇因坊总监正陈恒升、监正罗云松、程聚金、甲长牛同兴、吴少田、保正郭森明等，为恳示禁飭事。情中外订约以来久敦和好，彼此一视同仁。正等体朝廷柔远之经，遵各宪辑睦之示，凡坊内教堂、道堂及西人医馆、寓馆，无不协心保护，留意稽巡。无如明察易见，暗害难防，正等坊内原有福音道堂两处，一在九井街，一在朝阳街。否系失教幼童或无知痞匪，常于深更静夜，用大便糊抹两道堂大门之上，或用刀划烂门板，迭经堂内两医梅教士投正等称说。正等屡向同街居民谆嘱，令其父诫兄勉，勿再糊抹刻划，致召查究。殊言之谆谆，听者藐藐。正等常为互相稽查，亦难弋获。近日仍多糊抹，人皆掩鼻而过。似此任意妄为，故行践踏，如不思示禁，飭差查拿，将来设酿祸累，貽害匪浅。只得协恳仁天赏准出示张贴两道堂外严禁，并恳飭差留心查拿，以儆效尤，实为公便。伏乞大老爷台前 赏准施行

1895年，重庆九井街、朝阳街两处教堂，常常被泄愤的民众用大便糊抹大门，巴县衙门贴出严禁告示



传教士顾嫫玲 (Mira Cumber) 与四川学童

费看病的恩惠。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城东的四圣祠街，那里的四圣祠一直香火旺盛，祠中祭祀的是孔门四大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子游，自从基督教英美会有意无意地在四圣祠旁边开办了仁济医院，一下子就从老街坊中拉走了一批中国信徒。

教会对以“治病为传教手段”毫不讳言，医学传教士更是通过行医治病来大力发展教徒。教会医院一般都附设有“礼拜堂”、“福音堂”，供职员和病人做祷告。门诊部还派人向候诊者传教布道，复诊卷也印满了“圣经”。然而，靠一个两个外国人点点滴滴行医治病来拉拢教徒，所谓天国的蓝图，不知要

到猴年马月，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需要找到一个捷径。美国传教士赫斐秋 (Virgil C. Hart) 是一个“中国通”，针对四川人的仇外心理点出穴道：“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果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反洋情绪激昂的地方更为重要。”为了与传统的私塾、书院对抗，创办教会学校，招收中国子弟，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不惜血本地办学。1894年教会在重庆开办求精中学、广益中学、启明小学，1898年又开办法文学堂，至1901年四川各地各类教会学校已达四百六十所。

### 3. 洋人遭到报应

梯航来蜀的传教士们高举着十字架，高呼着要振救灵魂，振救苦难。可是他们却好像驶进滔滔江水中的帆船，航行在茫茫雾霭中，前途莫测。

对于那些突然闯入的传教士，四川人眼中充满了仇恨和怀疑的目光。四川人把旱灾的原因也归咎于外国人，认为是他们激怒了天上的神仙。谣传成都东门外一头犀牛站在干涸的河床中朝传教士们怒吼：“洋人在时，天是不会下雨的。”对洋人的报应就是攻击他

们、赶走他们、杀死他们！

1863年重庆率先发难，1865年酉阳教案，1866年重庆教案再起，1895年成都教案震撼川西，1890年、1898年大足余栋臣两次反教，1900年义和团的反教等，均让教会人士谈教案色变。一个统计数据颇有意味，四川是他们传教的重点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占全国第三位，可是四川爆发的打教堂、杀洋人的“教案”数量，占全国第一位。

教案一起，愤怒的群众不仅捣毁教堂，就连传教士住宅、福音堂、诊所、学校，也一并冲刷得干干净净。1895年成都教案中，权势煊赫的四川主教杜昂(Mnsgr. Donaud)，清



四川总督赵尔巽(一排右二)和外国领事

廷钦赐三品顶带，当民众铺天盖地而来时，他却傲然稳坐天主堂，以为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不料砖石却劈头盖脸袭来，被一块砖头打中后，他不得不趁着黑夜，偷偷地爬过高墙，落荒而逃。神父何忠义在群众冲击他的住宅时，也只得脱掉洋装，换上中国妇女的衣服，头顶红布披巾，乘着黑夜，夹杂在人群中才混出重围。传教士司蒂文孙、启尔德(O.L.Kilborn)的住宅被捣毁，只有慌不择路，从一个野狗经常出入之嵌板的破洞爬出来，穿过冷冷清清的小巷逃命。最后启尔德一家只得整天躲在邻居的一间小床上，放下蚊帐，当时天气炎热，床铺污浊，恶气扑鼻，数码之内就可以听见喊打之声。

侥幸逃命的神父，事后目睹被捣毁得片瓦不存的育婴堂，以及被活活打死的中国教徒，遂将暴动的原因归咎为川人的野蛮和愚昧，官员放任，歹徒的煽动等。四川人对教堂、教士的仇恨，固然有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情绪，比如很多人都深信洋人所到之处，详绘地图，勘测地势，一定是在四川寻找比本国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有对洋人的金发碧眼，穿着打扮，语言的不解，甚至说教堂内的箱里装着拐骗来的小孩，预备来做人肉筵席；医院专门取孕妇胎儿作标本，从结胎到分娩，月月齐全，这样活灵活现的故事传遍了各地。但四川人将新仇旧恨，家仇国怨统统发泄到传教士身上，更深层的原因还是西方列强入侵后，洋货的倾销，许多传统行业面临生存破产的危机，

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吃洋教的不法教民恃强凌弱，鱼肉乡民；教会不断扩张土地和房产等。

### 三、成都的伊甸园

#### 1. 川西坝子小中华

当年外国人乘铁甲船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在宜昌换乘小火轮穿越三峡，到达重庆，然后上行川南乐山，摇一橹乌篷船，即抵达成都锦江码头。

锦江的桨声、灯影，摇曳出了花团锦簇的蓉城。

在铸造成都繁荣昌盛的文明中，有两位历史人物令人们永远地怀念，那就是秦国的蜀郡太守、作为政治家的李冰，和汉代的蜀郡太守、作为教育家的文翁。

四川方言中，大到平原，小到一块平地都称为“坝子”，成都平原也就俗称川西坝子。通常人们口中的“天府之国”，指的就是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成都被占地一万余平方公里的平原所围绕，自秦代李冰父子兴修了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以来，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号称天府之土。

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着这一地区的富庶，自古以来就有“得蜀者得天下”的说法，